

晚唐宦官专权的表征、由来及儒生之敌意

——晚唐五代文学思想背景研究之一

李珣平

(湛江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广东 湛江 524048)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探讨晚唐宦官专权状况及儒家文官体系对它的敌意等。本文认为,晚唐宦官专权明显有扶立皇帝、任命节度使和监军等三大表征,其由来是皇帝的有意授权并通过“四贵”实施。从社会学看,儒家文官体系与宦官的斗争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其焦点是政治权力和经济目标;从文化人类学看,前者的敌意源于由竞争带来的危机感和嫉恨。

【关键词】晚唐;宦官专权;儒生敌意。

【作者简介】李珣平,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晚唐宦官专权并和儒家文官体系进行博弈,与朋党斗争不同。朋党斗争是同一群体内不同派系的博弈,更多带有私人性;而宦官专权并和儒家文官体系博弈却是不同群体的博弈,更多带有异己性。所以,后者残酷得多,也血腥得多。

一

晚唐宦官专权相当严重。甘露之变后,文宗(李昂,原名涵,809-840,在位827-840)曾泣下沾襟对翰林学士周墀(796-855)说自己受制于家奴。此家奴,就是指宦官。在我看来,晚唐宦官专权有三个互相联系且最重要的表征:一是多次扶立

皇帝;二是操控皇帝直接任命节度使或接收庶族士人子弟甚至世家子弟为养子并扶植其做官,且在京城及近畿巧取豪夺;三是主宰神策军军权并监天下所有方镇之兵。在儒生看来,这三点尤其是“扶立皇帝”“任命节度使”和“监军”等本是以宰相为首的儒家文官体系的份内事,但现在却被宦官抢夺了。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是后者仇视前者的现实原因之一。

这里先说第一点。

司马光(1019-1086)云:“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权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1]这是实话。从《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看,中唐以来至少有九位皇帝是由宦官扶立的。若把前二位(宪宗穆宗)

除外,晚唐以来有七位(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其中情况又有不同:(1)长庆四年(824),敬宗李湛(809-826,在位824-826)虽由太子册立但也得到了宦官同意。这从他一即位就大赏宦官和神策军等可以看出。“上赐宦官服色及锦彩金银甚众,或今日赐绿,明日赐绯”“神策军士,人赐绢10匹,钱10千”^[2]。这里的宦官,当指穆宗朝最得势并有扶立敬宗之功的梁守谦(779-827)、王守澄(?-835)等。(2)文宗武宗宣宗也由宦官扶立,但又不同。文宗之立有一个小插曲。宝历二年(827),宦官刘克明等弑敬宗后欲立绛王李悟,但被王守澄、梁守谦等否定而改立了江王(即文宗)^[3]。武宗(李炎,原名瀾,814-846,在位840-846)之立,如出一辙。开成五年(840)文宗病重,命宦官刘弘逸(生卒不详)与宰相杨嗣复(783-848)、李珣(784-852)等立太子李成美,亦被宦官仇士良(781-843)、鱼弘志(生卒不详)等否定,“矫诏”改立了颖王(即武宗)^[4]。由上可见,宦官内部不是铁板一块,利益所系,也有帮派。一派成功,另一派连同所欲立对象毫无例外被诛杀。算来只有宣宗(李忱,810-859,在位847-859)是直接由“诸宦官密于禁中定策”^[5]所立的。(3)宣宗以后,又重蹈覆辙。大中十三年(859),宣宗密嘱枢密使王归长(生卒不详)、马公儒(生卒不详)让三子夔王即位,但被左军中尉王宗实(生卒不详)否定,改立了太子郗王(即懿宗)^[6]。咸通十四年(873)懿宗(李漼,原名温,833-873,在位859-873)病重,左军中尉刘行深(生卒不详)、右军中尉韩文

约(生卒不详)等立少子普王为僖宗(李儇,原名俨,862-888,在位873-888)^[7]。光启三年(888),宦官杨复恭(?-894)、刘季述(?-901)立僖宗之弟寿王为昭宗(李晔,原名杰,又名敏,867-904,在位889-904)。昭宗天复三年(903),儒家文官体系借助保大节度使李茂贞(856-924,曾为武定节度使和凤翔节度使)之手开始杀宦官,至朱温(即朱全忠,852-912)全部杀绝。宦官扶立皇帝及专权之风,才告一段落。

必须说明,宦官扶立皇帝目的只是为了便于控制,而每一位新皇帝之被扶立也是自愿的和巴不得的。换言之,是新皇帝借助于宦官之手才登上九五之尊的。因此,从《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可知,被扶立皇帝有较大的自由性和自主权。可以说,没有新皇帝首肯,重大事情宦官一件也办不成。有些皇帝(如文宗)曾打算杀绝宦官,有些皇帝(如武宗、宣宗)虽未如此打算但不是因为宦官干预而是因为大权已经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都说明了皇帝的自主性与宦官权力的有限性(即使有扶立之功,权力也是有限的)。

二

次言第二点。

扶立皇帝只是宦官显示权高势重的手段,而操控皇帝以获取政治经济地位并保持荣华富贵才是目的。为什么这几个宦官热衷扶立此而那几个宦官热衷扶立彼且不惜以刃相向呢?也是这个原因。扶立有功,就可以操控皇帝并获取政治

经济地位和荣华富贵。对此,宦官一般通过两条途径来达成:一是直接任命节度使或让投靠自己的士人做官;二是在京城及近畿巧取豪夺。

前者,即“债帅”和“养子”现象。所谓债帅,即为了出任方镇节度使而大量举债贿赂中尉(统率禁军即神策军的宦官),事成之后又在辖区搜敛钱财偿还所负之债及息的人。据范文澜说,利息一般是本钱的三倍^[8]。债帅敢于举债,是因为有贿赂宦官担任节度使的绝对把握,此把握源于后者对皇帝的操控能力和对神策军的垄断权。德宗(李适,742-805,在位779-805)开始,宦官统率了神策军,而节度使亦多从神策军派出。一些神策军大将为了取得节度使之职,便出重息向长安富家借债送给中尉。中尉通过游说皇帝,再与枢密使通气,然后由中书省下任命书。文宗以后,问题更加严重。《资治通鉴》云:“开成(836)以来,神策将吏迁官,多不闻奏,直牒中书令覆奏施行,迁改殆无虚日。”^[9]所谓养子,又有两种:一是直接收养庶族士人子弟为养子,一是拉拢士人(或士人主动投靠)使之成为养子,目的都是使其做官以掌握朝廷某部门或地方某藩镇之权力为己服务。由于皇帝重用宦官,也由于走科举之路致富致贵稍慢,而投靠宦官较快,所以庶族士人甘心情愿让子弟做养子,而有些世家子弟亦热衷此道。《旧唐书》云“兰锜将臣,率皆子蓄,藩方戎帅,必以贿成”^[10],《新唐书》云“慆士奇材则养以为子,巨镇强藩则争出我门”^[11],都是此意。大宦官没有养子者几乎没有。文宗朝仇士

良至少有养子五人,懿宗朝杨复光(843-884)有养子数十人,同朝杨复恭养子则在六百人(有说八百)以上。养子复有养子(如文宗末被李德裕[787-849]收买的宦官杨钦义就是宦官杨志廉的养子,而杨钦义又有养子三人[玄翼、玄价、玄寔],杨复光是杨玄价的养子,杨复恭则是杨玄翼的养子),可谓养子遍天下。士人不用阉割只做名义上的养子者,也不乏其人。从《新唐书》卷一〇八可知,宪宗朝任荆南节度使且差一点儿当上宰相的裴均,就是大宦官窦文场(生卒不详)的养子。

后者,即巧取豪夺。《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对此有许多记载,晚唐文人诗词文赋中也有许多描述。其恶劣行径很多。例如在京城欺行霸市抽商贩份儿钱,以宫市名义强取老百姓财货,又如在近畿派爪牙以皇帝名义派款派丁四处掠夺等。由于扶立有功,更由于宦官掠取金钱财物也有皇帝的份儿(进入内库),所以皇帝对宦官及手下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仅如此,凡宦官与儒家文官体系发生冲突,皇帝也往往站在前者一边。这是儒家文官体系仇视宦官的又一原因。晚唐在京城做京兆尹或在近畿做地方官不是什么风光事而是苦差使。宪宗元和四年(809),许孟容(753-819)任京兆尹,因左神策军吏李昱贷钱三年不还而判其死刑,但中使只向宪宗说了一句话就被豁免了^[12]。敬宗宝历元年(825),郾县令崔发因中使“殴百姓”便命人逮捕,但结果不是中使被治罪而是县令几乎被敬宗纵容下的宦官们乱棍打死^[13]。

三

再言第三点。

债帅大多在京城附近方镇如鄜坊(陕西富县)、邠宁(陕西彬县)、凤翔(陕西凤翔县)等地做节度使。其目的,便于敛财却无甚危险。而其他方镇的节度使,也有一些是宦官养子或与宦官交结之人。此外,就是宦官自己做监军以控制地方上的方镇。

监军是宦官伸向各地方镇的一只巨手。从张国刚研究可知,唐代宦官监军在中国古代史上是“空前绝后”的^[14]。为什么?笔者认为,是由体制和权力造成的。从体制看,宦官监军在中晚唐以来一直有制度保障和组织保障。以制度言,张国刚发现,宦官监军遍布晚唐所有的五十多个方镇。不仅皇帝政令所及之处,就是那些做事专断的骄藩以及被羁縻的有割据能力的强藩,也有监军身影^[15]。以组织言,监军是隶属于皇帝的“自成一统”的独立体系,“是皇帝在方镇的‘常驻大使’,其常设机关为监军使院,监军使为之长,置印。其僚属有副使(副监)……有判官若干员……有小使若干员……还有自己的武装力量”^[16]。又有一套优渥的迁转程序。“监军使任职一般为3年,皇帝特赦则可提前调动或连续留任”^[17]。从权力看,监军使表面只负监军之责,“但他在方镇莫可与争的特权地位却足以使他权倾一切”^[18],扩大到方镇的“一切事务”之中。

必须说明,(1)监军名义上是皇帝“将我腹心之命达于爪牙之士”的使者,但实际上却通过控制方镇节度使的任命权也

控制了皇帝并左右了儒家文官体系^[19]。债帅现象属于前者,而协助士人如李德裕等获致相位属于后者。(2)监军职责名义上是监察即“监视刑赏,奏察违谬”,但实际上除监察外主要为皇帝敛财也为自己敛财。由于有监军存在,方镇节度使在每年四时节庆(含皇帝诞辰)、入觐调动及助军勋赏时都得进奉。其数额之大,相当惊人。据张国刚言,即便那些以种种借口少给或不给朝廷赋税的骄藩或强藩,在进奉上也不遗余力。“唐代藩镇进奉的数额是十分巨大的,进奉的藩镇甚至比上供的藩镇还要广泛和普遍”^[20]。注意,进奉与赋税不同,后者进的是国库而前者进的是皇帝私库。

四

宦官专权的由来,是皇帝的有意授权。

宦官专权是通过宦官中权力最高且最大的四贵实现的。四贵,即两个中尉、两个枢密使,都由皇帝一手造成。前者掌握禁军即神策军军权^[21],后者通过侵夺宰相权而掌握实际的行政权即诰命文书发布权。宦官专权与皇帝对宦官的信任以及对儒家文官体系的失望有关。一方面,在皇帝看来,宦官是被阉割的阉阉之臣即家奴,不可能有异心,由他们分享最高权力以保卫自己并聚敛财富,总比让儒家文官体系独揽要好一些。另一方面,儒家文官体系也确实让皇帝不放心。这帮人平日以忠君为题摇唇鼓舌,但一遇大事就不见了踪影且迅速在新朝

任职。例如,(1)建中四年(738),泾原节度使姚令言(?-784)发动兵变而德宗“诏集六军”时,由宰相调度的“六军”竟“无至者”^[22]。(2)德宗逃往奉天(陕西乾县)追随者只有儿女小老婆和宦官“百余人”^[23],满朝儒家文官竟无一个。(3)同年,朱泚(742-784)在长安称帝(国号“大秦”建元“应天”)并组建新朝,其中中央机构成员如源休、张光晟、李忠臣、蒋镇、蒋谏、敬釭、洪经纶、彭偃、裴揆、崔幼真……^[24]无一不是饱读诗书的儒家文官中人。可能因为有此教训,德宗贞元十二年(796)甫完成对神策军的调整与改编,就马上“特立护军中尉两员”,让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生卒不详)分别做了左右神策护军中尉^[25]。这是两中尉之始,也是债帅出现之源。《旧唐书》云:“藩镇节将,多出禁军,台省清要,时出其门。”^[26]至于两枢密使的出现,则为宪宗元和元年(806)。从《资治通鉴》可知,最早的枢密使叫“知枢密”,由宦官刘光琦(?-812)担任^[27]。枢密,本为皇帝的秘书或传达员,并无办公室之类机构^[28]。其职掌唯承受表奏于内进呈,若人主有所处分,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但宪宗变枢密为枢密使并设置枢密院,情况就不一样了,其目的就是为了制衡并侵夺宰相控制的儒家文官体系之权力。有的皇帝对宦官干扰皇权之行为有时也表现出警觉和厌恶,也曾经试图利用儒家文官体系予以遏制,但或由于儒家文官体系与掌权宦官不离不弃的关系而失败,或由于被宦官察觉而作罢。前者如太和五年

(831)文宗利用宋申锡(760-833)铲除王守澄却被京兆尹王璠告密,又如太和九年(835)文宗起用郑注(?-835)、李训(?-835)铲除宦官却因争功而引发甘露之变。后者如大中八年(846)宣宗与宰相令狐绹(795-872)密谋以自然减员方式逐步削夺宦官权力因被发觉而不了了之。

宦官参政本来是可控的,但由于以下两个原因却导致了尾大不掉。一是皇帝对宦官的绝对信任和依赖。有人说:“宦官是君主的家奴,完全附属于皇权,既无室家妻小之累,又无君临天下之机,即使权势膨胀到极点,也不会从根本上威胁皇权,这是宦官最受信任而难以铲除的根本原因。”^[29]很对,但只说明了绝对信任这一半。在我看来,还有绝对依赖而不愿铲除那一半。例如,皇帝对宰相及儒家文官体系的监督,对方镇节度使权力和军队的监督,对天下赋税的征收以及对所有方镇财税(如“羨余”)和进奉的催缴等,都依赖宦官完成。正因如此,有的皇帝虽不满宦官专权也试图缩小其一部分权力,却没有一个皇帝愿意废除枢密使制度和监军制度^[30]。二是宦官一旦在制度和组织上成为一个系统,就具备了对皇权的反作用。它既能制衡并侵夺儒家文官体系的权力,也就能制衡并侵夺皇权。敬宗以后九位皇帝的登基,都由四贵操作。甘露之变后一段时间,朝廷“杀、生、除、拜,皆决于两中尉,上不豫知”^[31]。

五

儒家文官体系对宦官专权的态度是

暧昧的和矛盾的。

一方面,儒家文官体系反对个别宦官专权却并不从根本上反对宦官制度的存在。《旧唐书》云:“自书契以来,不无宦寺,况垂之天象,备见职官。”^[32]“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载于诗礼,所以谨闺闼之禁,通内外之言,安可无也。”^[33]在儒学看来,凡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在宗法制和皇权主义中国,宦官一直存在。在儒家经典《周礼》《仪礼》《礼记》中,也有宦官名号地位及职责的详细且明确的规定。因此,对儒生来说,宦官制度不是不要,而是应按部门编制和职级人数予以确认。这就是新旧《唐书》“宦官传”开头那段话的言外之意。在他们看来,从部门言,宦官应有内侍省和五局(掖廷、宫闾、奚官、内仆、内府)等。从编制言,内侍省应有内侍、内常侍、内谒者、内给事、谒者、典引、寺伯、寺人等七十二人,五局应有宦官数百名。从职级言,宦官应有品级但不应立三品以上。如果能这样做,儒生认为,宦官制度就不仅应该存在而且还是一种美政^[34]。由于在根本上承认宦官存在之合理性,所以儒家文官体系并不拒绝与之交往,也不拒绝在必要时加以利用。为什么晚唐牛李两党在出将入相时都乐于与宦官打交道并走其门路,原因就在这里;为什么懿宗朝宰相杜悰(794-873,杜佑之孙,杜牧之堂兄)能与两枢密使达成共识并提出内外之臣共参国政的建议^[35],原因也在这里。

另一方面,儒家文官体系又敌视宦官,恨不得尽皆杀绝。儒家士人对宦官有

浓烈而持久的敌意。表征有二:一是从生理上羞辱之。二是从职位上排斥之。晚唐把敌视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是太和二年(828)刘蕡(?-838)应贤良方正科的对策^[36]。这种敌视由于冲突加剧而越来越累积,更由于欲诿过宦官来洗清自身无能的动机,竟发展到除之而后快的境地。昭宗天复三年(901)正月,以崔胤(853-904)为首的儒家文官体系借助李茂贞、朱温之手彻底清除了宦官^[37]。其顺序是先斩四贵(中尉韩全海、张彦弘和枢密使袁易简、周敬容),次斩内诸司使16人,然后尽斩第五可范等黄衣使者数百人^[38]。还杀了“随驾凤翔宦官200余人”“宫人宋柔等11人”^[39]。崔胤等杀红了眼,顺手把异己者也一起除掉。(1)他先使皇帝下诏,诛杀了“驾前宰相卢光启等一百余人”^[40]。(2)又让京兆尹郑元规在京兆府大开杀戒,处决了“两街僧道与宦官相善者20余人”^[41]。霎时一片腥风血雨!长安屠杀之场景被有的典籍描述为“血流涂地”^[42];而恐怖效果则是“冤号之声,彻于内外”^[43]。有的典籍数字更大,或云“尽诛800余人”^[44],或云“710人”^[45]。

有人说“宦寺特盛,亡唐之原”^[46],笔者认为不对。这是沿袭儒家文官体系的说法。事实上,杀绝宦官并未挽回晚唐颓势,相反使之迅速灭亡。仅三年,朱温就建了梁。为什么?在我看来,这是因为:(1)宦官与儒家文官体系是唐宗法制和皇权主义体制的四肢。一旦前者被杀绝,其左臂右腿已然断折。在这种情况下,只靠右臂右腿是无法行动甚至是无法站立的。(2)随

之而来的,是儒生的互相杀戮。朱温采纳柳璨、李振建议摧毁了整个儒家文官体系^[47]。柳璨、李振皆为儒生,区别仅在于,前者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宰相,而后者连番不第被辟为判官^[48]。宦官消失了,儒家文官体系也消失了,唐亦灭亡,剩下的只有军事独裁者朱温。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六

若从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看,也许更能说明双方敌视之深层原因。

从社会学看,儒家文官与宦官一样,都依赖于宗法制和皇权主义生存。由此,控制并利用皇权为己服务,是他们的共同点。谁能控制或利用得多一点谁的受益就大一些,反之就会受损。范文澜说儒家文官体系是士族的代表而“宦官是工商杂类在政治上的代表”^[49],虽有阶级论嫌疑,但将双方均视作宗法制和皇权主义的既得利益者却是对的。为了操控政权的实际占有者和唯一代表(皇帝)并分得一杯羹,双方争相把自己打扮成皇帝最忠实的奴仆和最真诚的支持者,而把对方说成是心怀叵测的异己者。受益或受损虽以经济利益(金钱货物)衡量,但能否取得经济利益却与政治权力相关。在宗法制和皇权主义社会,政治权力就是官职,而经济利益就是由官职带来的金钱货物等红利。应该说,这是他们之间斗得你死我活的根本原因之一。

从文化人类学看,儒生敌视宦官还有更深层隐衷。宦官作为远古祭师(阉割者)后继者的身份,常使儒家文官体系在潜意

识中有一种由竞争带来的危机。文化人类学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种族最早沟通天(神)人关系并代表前者行使人间统治权且赋予统治权合法性的人,都是祭师及后来的巫觋。要在人间宣谕天(神)的旨意,祭师必先使自己半人半神化,这就是阉割。阉割使祭师在生理上无性化并成为双性合一的有神性的人,也使阉割行为变成了一种崇高的道德献祭。有人说:“献身于宗教事业的神职人员用阉割方式象征自己超脱于男女性别之上,达到双性合一的神圣境界。”^[50]又说:“男性性器因其显而易察的生殖力而被看作是人体中最神圣的部位,因此也值得奉献给神明。”^[51]阉割造成了半人半神身份,再由半人半神身份代表神意而取得了对王位授予权和人间教育权的主宰,是祭师拥有王权确认者(意识形态阐释权)、历史记载者^[52]和社会施教者等多种职责与多重功能的最基础原因。

随着文明进展和科学萌芽,神权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由祭师等神职人员所把持的上述权力也逐渐被让渡给了巫觋与俗世文职人员。根据叶舒宪对中国宦寺概念三义与阿拉伯宦者三等级的比较研究可知,后者由“主”(Lord)到“师”(Master)再到“侍”(Servant)的每况愈下过程,与前者由“持”到“廷、正、官”再到“侍”的过程是一致的^[53]。又据日本学者山田村泰助(Mitamura Taisuke, 1909-1988)《中国宦官:一种近侍政治的结构》对甲骨文表示阉割的字所做的研究可知,中国宦官作为天子近“侍”的时间是在殷商武丁时期(约

前1250—前1192)^[54]。如果这一研究结果是对的,就说明至迟在武丁时代,中国阉割者的地位已下降为天子近侍亦即所谓的宦者(贴身服务员、通信员和卫生员等),而无须阉割的巫覡开始成为了具有意识形态阐释权的王权确认者、历史记载者和社会施教者。经过西周数百年发展再经过战国末期百家争鸣等经历,以宗法制为宣讲对象和崇拜对象的儒生逐步壮大并战胜巫覡。到西汉,由董仲舒发难并由汉武帝首肯,儒家文官体系最终接替了巫覡。儒生以歌颂武王“革命”的方式和神学“讖纬”的方式,亦能使皇权(“天子”)披上一层神的面纱。由此,他们垄断了俗世的意识形态阐释权、历史记载权和施教权,也使自身成为皇权须臾不可离弃的一种组织系统和行政系统。

尽管儒家文官体系已然确立,但潜意识深处那种在与祭师或巫覡竞争、接替及角色转换等活动中俱生的不适感及危机感却无法消除。毕竟,宦者阉割行为仍一代代顽强举行并未停止,其双性合一生理特征并未改变,神秘意味依然保留,与皇室连为一体并浸润的状况亦未变化。这一切,都使儒生焦虑以致敌视且代代延续。《新唐书》骂宦者为“小人”,说他们“残气不刚,柔情易迁,衰则无上,怖则生怨,借之权则专,为祸则迫而近,缓相攻,急相一”,又说“猥险无顾藉,日夕侍天子,狎则无威,习则不疑,昏君蔽于所昵,英主祸生所忽”^[55]等,都是从生理、人格、行为等侧面对宦官的激烈攻击,其目的当然是巩固皇帝对儒生的信任与眷宠。

七

在儒家话语中,宦官被视为木中之蠹和衣上之垢。欧阳修(1007—1073)说崔胤杀宦官是“灼火攻蠹,蠹尽木焚”^[56],司马光说是“恶衣之垢而焚之”^[57],意思都是为消除蠹和垢而损毁了木和衣。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不能盲从,必须做具体分析。首先,这是儒生的一家之言。因为《汉书》以后中国所有正史连同通鉴类著作都由儒家文官一手包办了。若从以上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看,古代儒生与宦官其实是一回事,都是寄生于宗法制和皇权主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把宦官视为蠹和垢而把儒家文官体系视为清理之人,本身就是美化自身并向皇帝邀功的说法。其次,把宗法制和皇权主义体制视为本体而把宦官视为蠹与垢,也是五代和北宋儒生总结了中国历史上三次杀绝宦官利弊之后的看法。

崔胤杀宦官前,还有两次同类事件。一为东汉末袁绍(?—202)干的,一为后赵末石冉闵(?—352)干的,加上崔胤一共三次。它们都导致了当时宗法制和皇权主义体制之倾覆,由此被五代北宋儒生一致谴责。《旧唐书》认为是“感伤和气,淫刑斯逞,可为伤心”^[58]之行为,《新唐书》认为是“假威柄于外以以内攘奸人”^[59]而使皇祚被篡之行为,《资治通鉴》认为是“虽快一时之忿而国随以亡……其为害岂不益多哉”^[60]之行为。其意为,个别坏宦官可以清除但宦官制度乃至宗法制和皇权主义体制不可破坏。此后儒家文官体系与宦官在敌视中共存共荣延至清末,就

是被这种看法所支配的。//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2009年度重大项目《隋唐五代文学艺术思想史》[项目批准号:2009JJJD750006]的一项成果,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基金资助)

注释:

[1][2][3][4][5][6][7][9][12][13][27][31][33][35][38][43][47][57][60][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4册)第264、254、262、298、328、349、383、296、188、258、176、288、537、355、534-535、534-535、551-552、537、537页,岳麓书社1990年版。

[8]范文澜:《中国通史》(第3册)第208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10][22][23][24][25][26][32][34][39][41][42][58][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84)第4754、6443、6443、6444、4766、6444、4755、4753、4779、4779、4779、4755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1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07)第5856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14][15][16][17][18][20]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第114、117、119、119、113、16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9]张国刚研究可能由于时间较早,故对监军隶属于皇帝一面论述较多,而对监军在控制方镇谋私并控制皇帝一面却几乎没有论述。笔者认为,是一大不足。

[21]神策军本为安史之乱时哥舒翰驻陕(陕县)的一支小部队,后被肃宗(李亨,711-762)、代宗(李豫,726-779)和德宗改编为中央禁军。如何改造及如何让宦官成为最高统帅,可参考黄永年:《神策军的由来和用于征伐》(《公元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18-42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该文借用了《唐会要》和《新唐书·兵志》等材料,对肃宗、代宗和宦官鱼朝恩等均有较客观评价,但对德宗设立两中尉之过程及动机却缺乏说明。

[28]杜文玉:《五代十国制度》第117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9]任爽:《唐朝典章制度》第49页,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1年版。

[30]张国刚说杀绝宦官是皇帝“仅有”的一次行为,笔者认为不对。杀个别宦官顶罪是李茂贞和昭宗密谋来应付由崔胤勾结来的朱温大军的,但彻底铲除宦官却是崔胤的意思。按昭宗想法,并不愿杀绝宦官。《资治通鉴》卷263云,昭宗对第五可范等宦官数百人被杀十分难过,私下“为文祭之”。讨论此事,除阅读新旧《唐书》“昭宗本纪”和“宦官传”外,还应阅读李茂贞李克用韩建崔胤等相关列传及晚唐五代笔记等。

[36][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0下)第5064-5077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杜牧也参加了这次考试并被录取。稍晚的李商隐则非常同情刘蕡,写有《哭刘蕡》一诗。

[37]李珣平:《崔胤为何杀卢光启并杀宦官》,据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943df70100ryc8.html。

[40][45][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15,载《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第1929、19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44][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08)第5901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46]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序录”第2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48]李珣平:《柳璨李振为何灭绝清流》,据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943df70100smui.html。

[49]范文澜:《中国通史》(第3册)第208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50][51][53][54]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第150、151、156、14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2]从司马迁被汉武帝判处宫刑一事可看出巫(祭司)、史与阉割者的密切关连,还可看出史官对历史记载权的掌握其实是其特殊身份(“巫”“祭司”)的延续。汉武帝为什么不判司马迁其他刑罚却偏偏判宫刑,今人觉得奇怪。但若从文化人类学去理解,就会明白。

[55][56][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07)第5856、5856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59][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08)第5902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